

张子昂, 保继刚. 多重距离对中国入境与出境旅游流的影响: 基于组态的视角 [J]. 地理科学, 2021, 41(1): 13-21. [Zhang Zi'ang, Bao Jigang. Effects of multiple distances on inbound and outbound tourism flows in China: A configuration-based perspective.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1, 41(1): 13-21.] doi: 10.13249/j.cnki.sgs.2021.01.002

多重距离对中国入境与出境旅游流的影响: 基于组态的视角

张子昂¹, 保继刚^{2,3}

(1.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2.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3. 中山大学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 中国出境旅游流的高速增长与入境旅游流趋于稳定的增长形成强烈反差, 明晰中国出入境旅游流之间的差异关系和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引入包含经济距离、文化距离、地理距离、制度距离的四维度距离理论框架(CAGE), 尝试从多重距离视角剖析近年来中国出入境旅游流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结构性差异, 并通过使用当下社会科学领域新的研究方法——定性比较分析(QCA)对中国出入境旅游流的作用路径进行组态分析。研究发现: ① 在时间层面上, 距离因素对近年来中国出入境旅游流的影响较为稳定; ② 对比中国出入境旅游流, 距离因素对于出境旅游流和入境旅游流的作用规律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性; ③ 对比高、非高净值国际旅游流, 距离因素对高出境旅游流和非高出境旅游流的作用方式不同。其中, 经济距离是高净值国际旅游流产生的核心条件; 地理距离、文化距离、制度距离分别是非高净值国际旅游流产生的核心条件。

关键词: 中国出入境旅游流; 定性比较分析(QCA); 经济距离; 地理距离; 文化距离; 制度距离; GAGE 距离框架
中图分类号: F5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21)01-0013-09

国际旅游流问题一直是旅游地理研究的核心与热点问题^[1,2]。随着中国经济的繁荣、中产阶级的崛起、个人和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加, 中国出境旅游业务发展迅猛, 出境游规模持续增长, 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客源国和消费国^[3]。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出境旅游发展年度报告 2019》显示, 2018 年中国出境旅游市场规模为 1.49 亿人次, 相比 2017 年同比增长 14.7%; 中国出境游客境外消费超过 1 300 亿美元, 增速超过 13%^[4]。反观入境旅游, 在包括放宽签证限制、完善交通网络和基础建设的情况下, 中国入境旅游在持续下滑 3 a 后于 2015 年实现回升, 并在 2018 年创下历史新高^[5]。据世界旅游联盟发布的《中国入境旅游数据分析报告(2019)》统计, 近 10 a 来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整体保持缓慢且平稳增长, 其中 2018 年入境旅游人次相比 2017 年增长 1.2%^[5]。

相比之下, 中国出境旅游市场的高速增长与入境旅游市场趋于稳定的增长形成强烈反差, 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了国家旅游部门的高度关注, 甚至提出征收出境旅游税等措施抑制出境游市场^[6]。因此, 探寻中国出入境旅游市场的结构特征与差异以及影响因素, 对明晰中国出入境旅游流的关系和作用机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同时对中国出入境旅游的战略与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目前对中国出入境旅游流的研究主要围绕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两大类展开。其中对于入境旅游流时空特征的探讨涵盖了入境旅游经济增长特征^[7]、时空差异演变^[8,9]、季节性特征与周期^[10]、交通通达性^[11]、入境服务质量^[12]、入境旅游网络^[13]等; 入境旅游影响因素包括了入境旅游与文化距离^[14]、经济收入^[15]、签证制度^[16]、友好城市数量^[17]等的相

收稿日期: 2020-09-08; 修订日期: 2020-12-17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20104002)资助。[Foundation: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41920104002).]

作者简介: 张子昂(1991-), 男, 新疆昌吉人,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与旅游规划。E-mail: zhangziangdid@126.com

通讯作者: 保继刚。E-mail: cesbjg@mail.sysu.edu.cn

相互作用关系;在研究尺度上,涉及从全国省际之间^[7-9]、主要旅游城市^[11,13]、单个市(县)^[10]、特殊国际合作区域(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13,17]等不同空间尺度的研究。相比之下,对于出境旅游流的研究较少,主要研究停留在对出境旅游目的地国家的时空分布^[18]以及文化距离^[19]、危机事件^[20]等对出境旅游的影响研究。少数学者还关注了出境旅游安全^[21]以及中国特殊出境旅游群体的识别^[22]等话题。而将入境旅游流与出境旅游流进行对比研究则更为鲜见,温晓金等尝试探索了“一带一路”国家的入境游客规模演化规律与中国出境游客的对应特征,揭示了二者在空间演化规律上呈现的分异特性^[3];梁茹等分析了中国与140个国家的出入境旅游流反转特征,并刻画出时空演化轨迹及主要的反转原因^[23]。综上所述,目前对于中国出入境旅游流的研究存在以下方面欠缺:①在对出入境旅游流的整合研究方面,目前对于二者之间的关联性及其规律研究较为缺乏,对于出入境旅游市场的作用联系认识有待进一步加深;②在研究视角方面,目前对于解释出入境旅游流的影响因素多是从单一或者独立因素层面展开,缺少具有整合性的理论视角;③在研究层次方面,目前的研究都只关注高净值出入境旅游流的特征,忽略了非高净值旅游市场规律特征所能提供的潜在理论价值;④在研究方法论方面,当前的研究基于以“回归”原理为基础的数理统计模型为主,包括计量经济模型、空间统计模型等,虽然经典的“回归”模型影响广泛,但在方法原理层面上也存在一定的局限,限制了研究者理解与解决问题的思路,亟需新的方法论出现,丰富研究方法论谱系。

本研究基于多重距离视角,通过引入国际贸易领域四维度距离理论框架(CAGE),使用当下政治学、社会学与管理学领域推崇的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论,分别选择2013年和2018年2个时间截面,对近年来中国高出入境、非高出入境旅游流的作用路径进行探索和挖掘,以期在不同层面对中国入境与出境旅游市场结构差异特征、演变规律及影响机理进行揭示。本研究同时将QCA方法应用于地理学领域,也希望能够在拓宽QCA方法论应用范畴的同时,为中国地理学研究注入新的方法论。

1 理论基础

1.1 距离与旅游流

距离是地理学中的核心概念,是影响人类行为的重要外在因素,同时也是研究者构建空间决策模型的重要变量^[24],它既具有物理维度又具有众多相对维度^[25]。其中,在物理维度层面,目前已经出现了3种针对旅游流的距离衰减关系,第一种是Bull提出旅游需求峰值随着感知旅行距离和时间成本的增加呈现指数下降^[26];McKercher发现了第二种模式,他认为只有在达到一定的距离门槛后,旅游需求才会下降^[27];McKercher和Lew随后提出的第三种模式,是在距离旅游客源市场较远的地方会出现第二个峰值^[28]。上述模式也揭示出物理距离本身并非是影响旅游流的唯一因素,还需要其他变量共同参与影响。因此,后续学者不断拓展距离概念维度,从不同距离视角开展研究。例如,有学者认为感知距离(Cognitive Distance)反映了旅游者对居住地与旅游目的地之间实际距离的认知加工过程和结果^[29],并列出了心理距离、空间距离、时间距离、社会距离等不同感知距离维度对旅游流的影响;也有学者认为文化对于旅游流的产生至关重要,并从文化距离的视角探索旅游需求规律,发现文化距离对于国际旅游流的影响同时起到正向和负向作用^[30]。

1.2 CAGE 距离框架

CAGE (Economic distance, Geographical distance, Cultural distance and Institution distance)距离框架是国际商业与贸易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框架之一,包含了文化距离、制度距离、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4个距离维度^[31]。CAGE框架的特点是突出了国家间的双边属性特征,捕捉了在不同维度层面双边距离测量方面的“差异”。CAGE的提出是对距离因素在不同产业和行业层面的整合^[31],目前已经在很多商业与贸易领域得到了检验。

2 研究方法 with 数据

2.1 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

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是一种以集合论与布尔代数为数理基础且用于多案例研究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旨在实现将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的优势进行整合^[32]。Gerring评价QCA是数十年来社会科学领域少有

的方法论改革之一^[33]。近年来, QCA 方法取得了飞速发展, 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34,35]。QCA 带给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已远远不只是一种技术性手段, 更是一种全新的研究逻辑, 并逐渐开始成为主流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36]。其中, QCA 的因果“非对称性”(asymmetry)假设原理(期望结果的出现与不出现的原因是不一样的), 弥补了传统分析技术中使用对称性假设的不足(即高值变量导致高结果的发生, 从而低值变量导致低结果的发生)。然而, 目前还鲜有研究将此方法应用于国内地理学研究, 本文尝试将其应用于旅游地理学, 同时也希望引起更多地理学者的关注。

QCA 独特性的表现方式之一是拥有独立的方法论术语体系, 其中“条件”区别于统计意义上的“变量”(“前因条件”“结果条件”分别对应“自变量”“因变量”), 由于 QCA 致力解释“非对称性”问题, 故在结果条件中一般二分为“高结果条件”和“非高结果条件”(“非高”是 QCA 惯用的术语, 避免与“低”混淆)。另外“核心条件”是指具有决定性前因成分的条件, 是构成结果成立的核心因素; 与此相对应的“辅助条件”则是对结果产生一定补充影响作用的条件^[32]; “组态”也即“路径”, 是与给定结果相关的条件的组合, 是 QCA 方法论所追求的结果呈现^[32]; 在 QCA 方法论体系中还有 2 个重要参数: 一致性与覆盖度。一致性表示共享给定前因条件组合的案例在展示特定结果方面的一致程度; 覆盖度则是评估了前因条件组合对结果集合实例的解释程度^[32]。

QCA 方法的实现步骤一般包括: 1) 对条件和结果的校准。所谓校准就是对案例赋予集合隶属度的过程, 这是实现 QCA 的基础前提, 目前主要有直接校准与间接校准两种方式, 本研究采用直接校准法^[32]对 CAGE 距离框架中的文化距离、地理距离、经济距离、政治距离等前因条件及出入境旅游人次结果条件进行校准, 由于缺乏外部理论标准, 本文参考先前的研究^[37], 对于前因条件的校准, 设定案例样本描述性统计的上四分位数(75%)、中位数(50%)、下四分位数(25%)分别作为 1(完全隶属)、0.5(交叉点)、0(完全不隶属)3 个锚点来校准原始数据; 在结果条件的校准上, 同样使用结果条件的 75%, 50%, 25% 分位数值分别作为完全隶属(高出/入境旅游流)、交叉点、完全不隶属(非高出/入境旅游流)的定性锚点; 2) 条件组态

的充分性分析。与必要性分析相反, QCA 的核心是要揭示不同属性距离所构成的不同组态引致高/非高出入境旅游流产生的充分性, 从集合论的角度而言, 充分性分析就是探索不同前因条件所构成的集合是否是结果集合的子集^[32], 并使用一致性参数衡量组态的充分性, Schneider 等认为充分性检验的一致性不应该低于 0.75^[38], 本研究遵循上述标准, 并将频数阈值设定为 2。最后, QCA 模型一般会呈现出 3 种不同复杂程度的解: 复杂解、中间解、简约解。本文同 QCA 主流研究保持一致, 选择汇报中间解, 辅助汇报简约解, 具体通过 fsQCA 软件(www.compass.org)实现。

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研究选取国际权威的欧睿(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数据库(<https://www.euromonitor.com>)对中国入境旅游流与出境旅游流数据进行采集和整理^[2,3], 并从中选择了数据相对完整且代表性较高的 64 个国家作为案例国(中国数据未包含港澳台地区)。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 本研究选取了 2013 年与 2018 年 2 个时间截面, 对比展现近年来距离因素对中国出入境旅游流作用路径的演变规律。此外, 地理距离采用了国际通用的 CEPII 网站(<http://www.cepii.fr>)公布的中国与案例国家的地理距离指数; 经济距离则是通过案例地国家与中国分别在 2013 年、2018 年 GDP 之比作为衡量, 其中各国 GDP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https://data.worldbank.org.cn>); 文化距离采用了 Kogut 等构建的文化距离指数(CDI)^[39]; 制度距离沿用相关研究所采用的全球治理指标体系(WGI, <http://info.worldbank.org/governance/wgi>), 其中包括反映东道国公共服务效率和政策有效性、对企业监管的强度和公正性、公民的政治话语权和公共事务参与度、政府的清廉及对腐败的控制 6 个方面的指标, 并且采用下述算法将这些指标进行综合:

$$ID_{ij} = \frac{1}{M} \sum_{m=1}^M \{(I_{mi} - I_{mj})^2 / V_m\} \quad (1)$$

式中, ID_{ij} 代表国家 i 与 j 之间的制度距离; I_{mi} 是国家 i 第 m 个维度得分, I_{mj} 是国家 j 第 m 个维度得分; V_m 是维度 m 的方差; M 是所有制度距离维度的数量。

3 中国国际旅游流距离因素作用结果

3.1 高入境/高出境旅游流作用路径与模式

从表 1、2 中可以看出, 无论是 2013 年还是

表 1 2013 年多重距离对中国高入境与高出境旅游流作用路径

Table 1 Paths of multiple distances on China's high inbound and outbound tourism flows in 2013

高入境旅游				高出境旅游					
	<i>RC</i>	<i>UC</i>	<i>C</i>		<i>RC</i>	<i>UC</i>	<i>C</i>		
M1:	~CD*ED	0.63	0.23	0.86	M1:	ED*ID	0.62	0.24	0.86
M2:	ED*ID	0.62	0.22	0.83	M2:	~GD*~CD*ED	0.54	0.16	0.85

总体解一致性:0.85

总体解覆盖度:0.82

M1路径:印度、韩国、巴西、德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土耳其、意大利、日本、沙特阿拉伯、泰国、西班牙、新加坡、马来西亚、瑞士

M2路径:德国、英国、加拿大、日本、美国、法国、澳大利亚、荷兰、瑞士、西班牙、波兰、瑞典、挪威、比利时、奥地利、丹麦、新加坡、韩国

总体解一致性:0.78

总体解覆盖度:0.82

M1路径:德国、英国、加拿大、日本、美国、法国、澳大利亚、荷兰、瑞士、西班牙、波兰、瑞典、挪威、比利时、奥地利、丹麦、新加坡、韩国

M2路径:印度、韩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土耳其、日本、沙特阿拉伯、泰国、德国、新加坡、马来西亚

注: M1~M2分别代表作用路径1~2; CD代表文化距离、ED代表经济距离、GD代表地理距离、ID代表制度距离; RC代表原始覆盖度; UC代表唯一覆盖度; C代表一致性。“*”代表逻辑“和”; “~”代表逻辑“非”; “核心条件”字体加粗。

表 2 2018 年多重距离对中国高入境与高出境旅游流作用路径

Table 2 Paths of multiple distances on China's high inbound and outbound tourism flows in 2018

高入境旅游				高出境旅游					
	<i>RC</i>	<i>UC</i>	<i>C</i>		<i>RC</i>	<i>UC</i>	<i>C</i>		
M1:	~CD*ED	0.62	0.12	0.90	M1:	ED*ID	0.62	0.21	0.82
M2:	GD*ED	0.62	0.03	0.83	M2:	~GD*~CD*ED	0.57	0.16	0.90
M3:	ED*ID	0.63	0.02	0.85					

总体解一致性:0.85

总体解覆盖度:0.81

M1路径:印度、韩国、巴西、德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土耳其、意大利、日本、沙特阿拉伯、泰国、西班牙、新加坡、马来西亚、瑞士

M2路径:美国、巴西、墨西哥、加拿大、西班牙、澳大利亚、法国、瑞士、意大利、英国、比利时、阿根廷、哥伦比亚、南非、荷兰

M3路径:德国、英国、加拿大、日本、美国、法国、澳大利亚、荷兰、瑞士、西班牙、波兰、瑞典、挪威、比利时、奥地利、丹麦、新加坡、韩国

总体解一致性:0.78

总体解覆盖度:0.81

M1路径:德国、英国、加拿大、日本、美国、法国、澳大利亚、荷兰、瑞士、西班牙、波兰、瑞典、挪威、比利时、奥地利、丹麦、新加坡、韩国

M2路径:印度、韩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土耳其、日本、沙特阿拉伯、泰国、德国、新加坡、马来西亚

注: M1~M3分别代表作用路径1~3; CD代表文化距离、ED代表经济距离、GD代表地理距离、ID代表制度距离; RC代表原始覆盖度; UC代表唯一覆盖度; C代表一致性。“*”代表逻辑“和”; “~”代表逻辑“非”; “核心条件”字体加粗。

2018年,距离作用下的中国高入境与高出境旅游流组态模型总体解的一致性与单个解的一致性均大于可接受的最低标准0.75,说明所有组态模型都具有统计学意义,模型结果具有较强的可靠性。其中对于高入境旅游流,2013年共有2条作用路径,分别是M1(~CD*ED)(在布尔代数中“*”代表逻辑“和”;“~”代表逻辑“非”,下同)和M2(ED*ID)。在M1中经济距离的存在与文化距离的缺失是影响中国高入境旅游流的核心条件;M2中经济距离同样发挥着核心作用,且同时需要制度距离的存在。这2条路径分别覆盖了15个和18个国家案例,原始覆盖率高达0.63与0.62,唯一覆盖率也达到了0.23与0.22。其中德国、日本、西班牙、新加坡、韩国5个国家同时具有M1与M2路径特征。通过进一步对比M1与M2,发现经济距离均存在于2条路径中,地理距离成为了可有可无的

条件,并且对于高入境旅游流国家不起决定性作用。此外,文化距离的缺失与制度距离的存在具有可替代性,也就是说这2个条件无需同时存在,便可以与M1、M2中经济距离条件一同导致高入境旅游流结果的发生。随着时间的推移,2018年距离因素对于高入境旅游流影响路径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演变。其中,在组态数量上增加了1条新路径,即表2中的M2(GD*ED)。这一路径将地理距离条件纳入,虽然只是作为M2路径中的辅助性条件,其所对应的案例国家包括美国、巴西、墨西哥、加拿大、西班牙、澳大利亚、法国、瑞士、意大利、英国、比利时、阿根廷、哥伦比亚、南非、荷兰;另外2条路径M1、M3在结构上没有发生改变,但在单个条件因素的作用程度上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M1中文化距离的缺失与M3制度距离的存在都成为非核心条件,只起到辅助性作用,说明在致使

高入境旅游流发生的条件中,文化距离开始逐渐发挥重要作用,而制度距离作用效果缩减。

相较于高入境旅游流的作用路径,高出境旅游流路径在数量和结构上具有较强的相似性,并且随着时间的演变,距离因素对高入境旅游流的影响没有发生改变,稳定性较强。其中, M1(ED*ID)路径的经济距离与制度距离均起到核心作用,包括的 18 个案例国家有德国、英国、加拿大、日本、美国、法国、澳大利亚、荷兰、瑞士、西班牙、波兰、瑞典、挪威、比利时、奥地利、丹麦、新加坡、韩国; M2(~GD*~CD*ED)路径中经济距离依旧起核心作用,与之相配合的是地理距离与文化距离的缺失,组成其路径的 11 个国家包括印度、韩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土耳其、日本、沙特阿拉伯、泰国、德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其中,韩国、日本、德国、新加坡共同具备这两条作用路径。

3.2 非高入境/出境旅游流作用路径与模式

QCA 方法的优势之一就是能够识别出“非高”结果的条件构型。因此,利用这一方法特点,我们发现形成非高入境/出境旅游流的距离因素与高净值旅游流作用因素不存在对称关系,并且更为复杂。此外,非高入境旅游流与非高出境旅游流的构型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同时也保持一定的差异。表 3 中展现出 2013 年中国非高入境旅游流作用路径共有 4 条,其中总体解的一致性为 0.76,整体覆盖度达到了 0.92。M1(CD*~ED)中文化距离作为核心条件起着关键性作用,经济距离条件的缺

失起到辅助作用。此外, M1 中的一致性达到了 0.97,原始覆盖度为 0.57,唯一覆盖度为 0.07。M2(~GD*~ED*ID)则是以制度距离为核心条件,地理距离与经济距离的缺失为辅助性条件。M3(GD*~ID)与 M4(GD*~CD*ED)具有相同的核心条件,也就是地理距离的存在,但在辅助性作用方面,二者不完全相同。其中, M3 表现在制度距离的缺失; M4 则表现在经济距离的存在,以及文化距离的缺失。此外, M3 在一致性(0.93)、覆盖度(0.53)上均高于 M4(0.92, 0.11),在唯一覆盖度上 M3 也高于 M4,分别覆盖 13 个案例与 2 个案例。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间的演变,非高入境旅游流的影响路径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仍然是以文化距离、地理距离、制度距离为核心条件(表 4)。其中,以文化距离与制度距离为核心条件所代表的路径 M1、M2 在结构上没有发生变化,以地理距离为核心的 M3 和 M4 在辅助性条件上有所改变, M3 中缺失经济距离, M4 中则削弱了制度距离,并且增加了文化距离因素。在所对应的案例国家上, M3 与 M4 分别包含 6 个与 7 个案例国家。相较于非高入境旅游流,非高出境旅游流在路径数量上较少,且多数路径都与非高入境旅游流路径相同。因此,同高入境与高出境旅游流之间作用规律一致,非高入境与非高出境旅游流之间的距离作用也具有很强的相似性。从表 3、4 中能够看出 2018 年非高出境旅游流多增加了一条以制度距离为核心条件,地理距离与经济距离的缺失为辅助性条

表 3 2013 年多重距离对中国非高入境与非高出境旅游流作用路径

Table 3 Paths of multiple distances on China's not-high inbound and outbound tourism flows in 2013

非高入境旅游				非高出境旅游					
		RC	UC		RC	UC	C		
M1:	CD* ~ED	0.57	0.07	0.97	M1:	GD*~ID	0.54	0.17	0.94
M2:	~GD*~ED* ID	0.38	0.02	0.96	M2:	CD*~ED	0.55	0.17	0.93
M3:	GD* ~ID	0.53	0.10	0.93					
M4:	GD*~CD* ED	0.11	0.01	0.92					
总体解一致性:0.76				总体解一致性:0.72					
总体解覆盖度:0.92				总体解覆盖度:0.91					
M1路径:冰岛、乌拉圭、马耳他、莫桑比克、拉脱维亚、匈牙利、秘鲁、斯洛文尼亚、智利、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埃及、芬兰				M1路径:秘鲁、哥伦比亚、阿根廷、巴西、多米尼亚共和国、墨西哥、南非、莫桑比克、尼日利亚、摩洛哥、坦桑尼亚、克罗地亚、希腊					
M2路径: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斯洛文尼亚、捷克、芬兰				M2路径:冰岛、乌拉圭、马耳他、莫桑比克、拉脱维亚、匈牙利、秘鲁、斯洛文尼亚、智利、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埃及、芬兰					
M3路径:秘鲁、哥伦比亚、阿根廷、巴西、多米尼亚共和国、墨西哥、南非、莫桑比克、尼日利亚、摩洛哥、坦桑尼亚、克罗地亚、希腊									
M4路径:巴西、秘鲁									

注: M1~M4 分别代表作用路径 1~4; CD 代表文化距离、ED 代表经济距离、GD 代表地理距离、ID 代表制度距离; RC 代表原始覆盖度; UC 代表唯一覆盖度; C 代表一致性。“*”代表逻辑“和”;“~”代表逻辑“非”;“核心条件”字体加粗。

表 4 2018 年多重距离对中国非高入境与非高出境旅游流作用路径

Table 4 Paths of multiple distances on China's not-high inbound and outbound tourism flows in 2018

非高入境旅游				非高出境旅游					
		RC	UC		RC	UC	C		
M1:	CD*~ED	0.59	0.07	0.96	M1:	GD*~ID	0.54	0.14	0.98
M2:	GD*~ED*~ID	0.47	0.06	0.99	M2:	CD*~ED	0.55	0.05	0.92
M3:	~GD*~ED*ID	0.41	0.03	0.96	M3:	~GD*~ED*ID	0.39	0.02	0.93
M4:	GD*CD*~ID	0.43	0.05	0.96					

总体解一致性: 0.75

总体解覆盖度: 0.94

M1路径: 秘鲁、哥伦比亚、阿根廷、巴西、多米尼亚共和国、墨西哥、南非、莫桑比克、尼日利亚、摩洛哥、坦桑尼亚、克罗地亚、希腊

M2路径: 多米尼亚共和国、莫桑比克、秘鲁、摩洛哥、坦桑尼亚、克罗地亚、希腊

M3路径: 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斯洛文尼亚、捷克、芬兰

M4路径: 哥伦比亚、阿根廷、墨西哥、莫桑比克、秘鲁、希腊、南非

总体解一致性: 0.74

总体解覆盖度: 0.92

M1路径: 秘鲁、哥伦比亚、阿根廷、巴西、多米尼亚共和国、墨西哥、南非、莫桑比克、尼日利亚、摩洛哥、坦桑尼亚、克罗地亚、希腊

M2路径: 冰岛、乌拉圭、马耳他、莫桑比克、拉脱维亚、匈牙利、秘鲁、斯洛文尼亚、智利、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埃及、芬兰

M3路径: 芬兰、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斯洛文尼亚、捷克

注: M1~M4分别代表作用路径1~4; CD代表文化距离、ED代表经济距离、GD代表地理距离、ID代表制度距离; RC代表原始覆盖度; UC代表唯一覆盖度; C代表一致性。“*”代表逻辑“和”;“~”代表逻辑“非”;“核心条件”字体加粗。

件的路径(M3),这一路径所对应的案例国家有芬兰、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斯洛文尼亚、捷克共和国。

4 管理启示

本研究对政府旅游管理机构和旅游企业具有一定的管理启示:对政府管理机构而言,首先需要认清的是距离因素影响中国高入境和高出境旅游流的路径有很多条。因此在制定国家旅游战略和进行国家旅游形象输出时,应当根据不同路径所配置的条件以及所对应的细分国家进行科学统筹。另外,经济距离是影响国际高净值旅游流的核心条件,经济距离的拉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该国国际旅游产业的发展,因此国家综合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与此同时,在对非高净值国家制定出入境旅游发展策略时同样需要因地制宜,应当对应不同国家的经济、制度、文化、地理距离的组合路径,调整对未来国际旅游市场的应对方向,实施差异化的国际旅游发展战略。

从旅游企业角度而言,尤其是经营以国际旅游市场营销为核心业务的企业(如各大OTA企业),可以通过多种路径并施的方式,灵活制定旅游营销策略,实现精准营销。

5 结论

本研究引入当下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应用广泛的QCA研究方法,利用组态的思维探索距离维度

关联对中国入境与出境旅游流的复杂性路径模式及其演变规律,同时也对高净值与非高净值国际旅游流的距离影响差异研究进行对比,分别从时间演变、入境与出境旅游流对比、高净值与非高净值旅游流对比3个层面揭示距离因素的内在作用规律。首先,随着时间的推移,距离因素对中国入境旅游流与出境旅游流的作用路径与模式均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但是引致入境/出境旅游流发生的核心因素几乎没有发生改变,也就是说近年来经济距离、地理距离、文化距离、制度距离分别对高入境与非高入境旅游流、高出境与非高出境旅游流的作用机理没有发生改变。因此,可以总结出:①在时间层面上,距离因素对近年来中国入境旅游流与出境旅游流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稳定性;②对比中国入境旅游流与中国出境旅游流,距离因素对于二者的作用规律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其中,无论是入境还是出境,高净值旅游流中经济距离均起核心作用,且地理距离不起决定性作用;非高净值旅游流中则是地理距离、文化距离、制度距离分别起核心作用,经济距离不起关键性作用;③对比中国高净值国际旅游流与非高净值国际旅游流,距离因素对二者的作用方式不同。其中,经济距离是高净值国际旅游流产生的核心条件;地理距离、文化距离、制度距离分别是非高净值国际旅游流产生的核心条件。

“距离”概念对于地理学研究者而言非常重要,已经有不少地理现象和规律依赖距离因素进行解

释。CAGE 距离框架是国际商业与贸易研究领域的重要理论,本文通过跨学科引入 CAGE 框架进行旅游地理学问题的研究,并且发现无论是地理学中对于距离因素的研究还是 CAGE 框架的先前应用,都很少去探讨不同距离维度间的交互作用,这其中方法论限制的原因。出入境旅游流是旅游地理学基础性的研究话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指导价值。目前,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可靠性以及方法论的限制,缺少更多更深入的分析 and 讨论。本研究在新方法论的引入方面做了尝试,同时也呼吁更多的研究视角和新方法进入,加深对 中国出入境旅游流的研究。尤其当下,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严重影响着国际旅游流的走势,未来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中国入境旅游流与出境旅游流会呈现怎样的演变特征、发展趋势及响应措施等现实课题都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保继刚, 楚义芳. 旅游地理学 (第三版)[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 [Bao Jigang, Chu Yifang. Tourism Geography(3rd ed).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12.]
- [2] 蒋依依, 温晓金, 刘焱序. 2001-2015年中国出境旅游流位序规模演化特征[J]. 地理学报, 2018, 73(12): 2468-2480. [Jiang Yiyi, Wen Xiaojin, Liu Yanxu. Evolutionary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outbound tourism flow in rank-size distribution from 2001 to 2015.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73(12): 2468-2480.]
- [3] 温晓金, 蒋依依, 刘焱序. “一带一路”国家入境游客规模演化规律与中国出境游客的对应特征[J]. 资源科学, 2019, 41(5): 931-942. [Wen Xiaojin, Jiang Yiyi, Liu Yanxu. Inbound tourism from destination countries in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 and corresponding outbound tourism from China during 2001 to 2015. *Resources Science*, 2019, 41(5): 931-942.]
- [4] 中国旅游研究院. 中国出境旅游发展年度报告2019[R]. 2019. [China Tourism Academy. China outbound tourism development annual report 2019.2019.]
- [5] 世界旅游联盟. 中国入境旅游数据分析报告2019[R]. 2019. [World Tourism Alliance. Data analysis report of China's inbound tourism. 2019.]
- [6] 蒋依依, 刘祥艳, 宋慧林. 出境旅游需求的影响因素——兼论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异同[J]. 旅游学刊, 2017, 32(1): 16-25. [Jiang Yiyi, Liu Xiangyan, Song Huil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outbound tourism and their different functions in developing and developed economies. *Tourism Tribune*, 2017, 32(1): 16-25.]
- [7] 王钊, 李涛, 杨山. 中国省际入境旅游集散优势度与旅游经济效率的空间关系[J]. 地理研究, 2020, 39(4): 892-906. [Wang Zhao, Li Tao, Yang Shan.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inbound tourist distribution superiority and tourism economic efficiency among provinces in China.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0, 39(4): 892-906.]
- [8] 张子昂, 黄震方, 曹芳东, 等. 浙江省县域入境旅游时空跃迁特征及驱动机制[J]. 地理研究, 2016, 35(6): 1177-1192. [Zhang Ziang, Huang Zhenfang, Cao Fangdong et al. The space-time transi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driving mechanism of county-scale inbound tourism in Zhejiang province.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6, 35(6): 1177-1192.]
- [9] 郭永锐, 张捷, 卢韶婧, 等. 中国入境旅游经济空间格局的时空动态性[J]. 地理科学, 2014, 34(11): 1299-1304. [Guo Yongrui, Zhang Jie, Lu Shaojing et al. Spatio-temporal change of the inbound tourism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34(11): 1299-1304.]
- [10] 张子昂, 黄震方, 孔少君, 等. 近30年浙江省入境旅游周期波动特征及影响机制[J]. 经济地理, 2016, 36(1): 186-193. [Zhang Ziang, Huang Zhenfang, Kong Shaojun et al. The periodic and fluctuant characteristics of Zhejiang inbound tourism and its influence mechanism in recent 30 years. *Economic Geography*, 2016, 36(1): 186-193.]
- [11] 周芳如, 吴晋峰, 吴潘, 等. 中国主要入境旅游城市交通通达性对比研究[J]. 旅游学刊, 2016, 31(2): 12-22. [Zhou Fangru, Wu Jinfeng, Wu Pan et al.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the transportation accessibility of main inbound tourism cities in China. *Tourism Tribune*, 2016, 31(2): 12-22.]
- [12] 黄毅, 马耀峰, 薛华菊. 中国入境旅游服务质量时空态势演变与区域影响因素[J]. 地理学报, 2013, 68(12): 1689-1701. [Huang Yi, Ma Yaofeng, Xue Huaju. Spatio-temporal-situational evolution and regional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inbound tourism service quality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3, 68(12): 1689-1701.]
- [13] 殷杰, 郑向敏, 李实. 合作态势与权力角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旅游合作网络解构[J]. 经济地理, 2019, 39(7): 216-224. [Yin Jie, Zheng Xiangmin, Li Shi. Cooperation situation and power role——Deconstruction of tourism cooperation network of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conomic Geography*, 2019, 39(7): 216-224.]
- [14] 周玲强, 毕娟. 文化距离对国际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的影响——以中国入境游市场为例[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 47(4): 130-142. [Zhou Lingqiang, Bi Juan.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distance on international tourism destination choices——A case study of Chinese inbound tourism market.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7, 47(4): 130-142.]
- [15] 刘汉, 宋海岩, 王永莲. 入境旅游人数、收入与我国经济增长——基于混频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实证研究[J]. 经济管理, 2016, 38(9): 149-160. [Liu Han, Song Haiyan, Wang Yonglian. Inbound tourism demand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mixed frequency

- granger causality tests. *Business Management Journal*, 2016, 38(9): 149-160.]
- [16] 王亚辉, 吴云超. 签证制度与入境游客流——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J]. *旅游科学*, 2017, 31(5): 17-31. [Wang Yahui, Wu Yunchao. Visa regulations and flows of inbound visitors—A gravity-model-based empirical study. *Tourism Science*, 2017, 31(5): 17-31.]
- [17] 王亚辉, 全华, 尹玉芳. 国际友城的入境游效应——来自中国38个客源国的经验证据[J]. *经济管理*, 2017, 39(3): 146-161. [Wang Yahui, Quan Hua, Yin Yufang. A Study on international friendship cities' effects on China's inbound tourism—Based on empirical evidences from 38 original countries. *Business Management Journal*, 2017, 39(3): 146-161.]
- [18] 包富华, 陈瑛. 近10年以来中国出境旅游的时空分布特征研究[J]. *世界地理研究*, 2017, 26(2): 127-139. [Bao Fuhua, Chen Ying. Research on the spatial-tempor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outbound tourism in the past 10 years. *World Regional Studies*, 2017, 26(2): 127-139.]
- [19] 杨昶, 刘宏博, 李想. 文化距离对旅游目的地选择的影响: 以日本和中国大陆出境游为例[J]. *旅游学刊*, 2016, 31(10): 45-55. [Yang Yang, Liu Hongbo, Li Xiang. The influences of national cultural distance on international destination choice of Japanese and Chinese residents. *Tourism Tribune*, 2016, 31(10): 45-55.]
- [20] Jin X C, Qu M, Bao J. Impact of crisis events on Chinese outbound tourist flow: A framework for post-events growth[J]. *Tourism Management*, 2019, 74: 334-344.
- [21] 黄锐, 谢朝武. 中国出境旅游安全事故时空分布格局及形成机制[J]. *人文地理*, 2019, 34(6): 120-128. [Huang Rui, Xie Chaowu.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Chinese outbound tourists' safety accidents. *Human Geography*, 2019, 34(6): 120-128.]
- [22] Bao J, Jin X, Weaver D. Profiling the elite middle-age Chinese outbound travellers: A 3rd wave?[J].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2019, 22(5): 561-574.
- [23] 梁茹, 孙根年. 中国与140个伙伴国出入境旅游市场反转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1995-2016年客流量数据[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8, 46(5): 108-119. [Liang Ru, Sun Gennian. Analysis of inbound and outbound tourism market reversal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between China and 140 partner countries—Based on tourist flow data from 1995 to 2016. *Journal of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18, 46(5): 108-119.]
- [24] 曹晶晶, 章锦河, 周珺, 等. “远方”有多远?——感知距离对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影响的研究进展[J]. *旅游学刊*, 2018, 33(7): 103-118. [Cao Jingjing, Zhang Jinhe, Zhou Jun et al. How far is 'far'?—Progress and implications in tourism and cognitive distance research. *Tourism Tribune*, 2018, 33(7): 103-118.]
- [25] Castree N, Kitchin R, Rogers A. A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26] Bull A. Economics of travel and tourism[M]. Longman Australia Pty Ltd, 1995.
- [27] McKercher B. The effect of distance decay on visitor mix at coastal destinations[J]. *Pacific Tourism Review*, 1998, 2(3/4): 215-223.
- [28] McKercher B, Lew A A. Distance decay and the impact of effective tourism exclusion zones on international travel flows[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03, 42(2): 159-165.
- [29] 曹晶晶, 章锦河, 王昶, 等. 距离欲对旅游者目的地选择影响的解释框架[J]. *地理学报*, 2020, 75(4): 860-877. [Cao Jingjing, Zhang jinhe, Wang Chang et al. Exploring the essence of distance: A framework of distance desire and tourist destination choice.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75(4): 860-877.]
- [30] Ng S I, Lee J A, Soutar G N. Tourists' intention to visit a country: The impact of cultural distance[J]. *Tourism Management*, 2007, 28(6): 1497-1506.
- [31] Ghemawat P. Distance still matters[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01, 79(8): 137-147.
- [32] Ragin C C. Re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Fuzzy sets and beyond[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 [33] Gerring J. Qualitative methods[J].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7, 20: 15-36.
- [34] Du Y, Kim P H. One size does not fit all: Strategy configurations, complex environments, and new venture performance in emerging economies[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21, 124: 272-285.
- [35] 杜运周, 贾良定. 组态视角与定性比较分析(QCA)——管理学研究的一条新道路[J]. *管理世界*, 2017(6): 155-167. [Du Yunzhou, Jia Liangding. The configurational perspective and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A new direction of management research. *Management World*, 2017(6): 155-167.]
- [36] 杜运周, 刘秋辰, 程建青. 什么样的营商环境生态产生城市高创业活跃度?——基于制度组态的分析[J]. *管理世界*, 2020, 36(9): 141-155. [Du Yunzhou, Liu Qiuchen, Cheng Jianqing. What kind of ecosystem for doing business will contribute to city-level high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A research based on institutional configurations. *Management World*, 2020, 36(9): 141-155.]
- [37] Fiss P C. Building better causal theories: A fuzzy set approach to typologies in organization research[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1, 54(2): 393-420.
- [38] Schneider C Q, Wagemann C. Set-theoretic method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A guide to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 [39] Kogut B, Singh H. The effect of national culture on the choice of entry mod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88(3): 411-432.

Effects of Multiple Distances on Inbound and Outbound Tourism Flows in China: A Configuration-based Perspective

Zhang Ziang¹, Bao Jigang^{2,3}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Guangdong, China*; 2.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Guangdong, China*; 3. *Center for Tourism Planning and Research,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Tourist flows is one of the current issues in the field of tourism geography that should be urgently addressed. There is a sharp contrast between the rapid growth of China's outbound tourism flow and the steady growth of inbound tourism flow.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understand the mutual tourist flows from and to China. Based on the multiple distances perspectives, this research draws upon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field distance theory framework which includes economical distance, geographical distance, cultural distance and institution distance (CAGE), and the research method is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 method, which is very useful in exploring the path and mechanism of China's high and low inbound and outbound tourism flows. In so doing,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differences, evolution rules and influencing mechanisms of China's inbound and outbound tourism at different levels can be analysed.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he influence of distance, as an influential factor is relatively certain. 2) Particularly, it influences China outbound tourism in a similar way that it affects the inbound tourism development. 3) When comparing China's high international tourism flow and China's low international tourism flow, distance has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m. Among them, economic distance is the core condition of high international tourism flow. Geographical distance, cultural distance and institutional distance are the core conditions of low international tourism flow.

Key words: China's inbound and outbound tourism flows;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 economical distance; geographical distance; cultural distance; institution distance; framework with economical distance, geographical distance, cultural distance and institution distance (CAGE)